



## ■ 孙连五

现代诗人吴兴华是被誉为能够比肩陈寅恪、钱锺书的中西通才。吴兴华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，熟读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洋现代文学，并对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有较高的造诣，他所译的里尔克、莎士比亚、但丁等名家名作在学界有很高声誉，被读者广为传颂。吴兴华很早就开始诗歌写作，由于他一直处在沦陷区，发表的诗作并不多，因此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诗坛，吴兴华的名气反倒不大。吴兴华与钱锺书的学问孰高孰低，在当下常常被人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。谈及他们之间的渊源，应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。当时，吴兴华因病北平，生活拮据，但却发奋要饱览中西文学，钱锺书是他仰望与学习的榜样。他与钱锺书虽然无缘见面，但却因为《谈艺录》产生了交集，本文就从《风吹在水上：致宋淇书信集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）中的一处注释谈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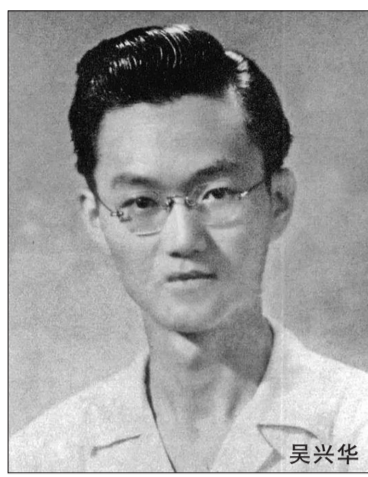
吴兴华在1943年10月22日致宋淇信中谈到，“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，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，论断精辟，使我不胜钦佩。”关于此处的“杂感集”，书信注释指“《谈艺录》未刊稿”。解志熙在《艺文有奇闻，只怕想当然》（《东吴学术》2017年第2期）中推测“杂感集”实际应为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这本随笔集于1941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，列入“开明文学新刊”，书中收《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》《窗》《论快乐》《说笑》《吃饭》《读伊索寓言》《谈教训》《一个偏见》《释文盲》《论文人》等10篇文章。从这些文章的行文风格来看，确实体现了钱锺书一贯“援引浩博、论断精辟”的特点，这部随笔集在北平也是比较容易买到的。笔者赞同解志熙教授的推断，吴兴华所读杂感集应是《写在人生边

上》，而非《谈艺录》。然而，笔者认为吴兴华虽然没有读过《谈艺录》，他应该已经知道了钱锺书的这部著作，他的好友宋淇很可能在通信中将《谈艺录》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了他。宋淇（又名宋梯芬）在1939年从光华大学重返燕京大学继续学业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这一时期结识了吴兴华，两人志同道合，一起创办了《燕京文学》月刊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，燕京大学被日军强制关闭，《燕京文学》也因此停刊，宋淇在该年底离开吴兴华返回上海，二人之间开始了频繁通信。

钱锺书的《谈艺录》从撰写到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时间。正如钱锺书在序中所言：“《谈艺录》一卷，虽赏析之作，而实忧患之书也”。钱锺书自1939年夏天从昆明回上海小住时就开始了写作《谈艺录》，1939年秋到湖南蓝天师范学院任教时期，《谈艺录》的写作条目逐渐增多，整部书的雏形也初步形成。1941年夏，钱锺书回上海探亲，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，只得滞留于沦陷区，因此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修订《谈艺录》。从该书序中可知，其成书时间是壬午中元日（1942年农历7月15日）。1941年底，宋淇回到上海后结识了不少沪上名流，包括傅雷、钱锺书、周煦良等人。1942年，宋淇去拜访钱锺书时，浏览了《谈艺录》手稿。钱锺书在《赠宋梯芬淇君索观谈艺录稿》中有所记录：“微言妙质得谁知，年少东来信起予。将母呕心休觅句，绍翁剖腹肯留书。人擅恰办竹笋肉，文古能穷柳贯鱼。疏凿诗中榘出手，君家绪有茗香馥。”可以看得出来，宋淇与钱锺书保持了很好的关系，钱锺书对宋淇也颇为赞赏，在《槐聚诗存》中另有一首《答梯芬》（1943年）即是他们友谊的写照：“海内文章孰定评，观书月眼子能明。年来渐似欧阳九，不畏先生法后生。”至于宋淇索观《谈艺录》的具体时间，笔者认为应该在1942年中元节以后。因为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未定稿之前，大

概不会随便示人，他在序言中也谈到，《谈艺录》脱稿之后，才在很多好友间借观流传，其中提到有沈兼士、徐森玉、唐庚、柯灵、王伯祥、叶圣陶、周振甫、华元龙等诸人。在看了《谈艺录》后，宋淇很可能告诉在北平的好友吴兴华，他们在书信里几乎无话不谈，还多次谈到了钱锺书，吴兴华对钱锺书的敬仰也溢于言表。《写在人生边上》是钱锺书出版的第一本书，吴兴华读了之后不胜钦佩，感叹“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，不能踵门求教，请你若见到他时，可代我转致敬慕之意”。至于宋淇是否向钱锺书转达了这位北平青年对他的“敬慕之意”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吴兴华显然对钱锺书的著作十分关注。1947年5月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钱锺书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，吴兴华曾让宋淇代去购买。1948年6月，开明书店出版了《谈艺录》，很快，吴兴华就委托上海的另一个好友张芝联给他寄去了。

张芝联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之子，他与吴兴华也相识于燕京大学。1935年，宋淇与张芝联就是燕京大学同学，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二人离开北平南下，最终进了光华大学，在这里，他们又结交了中央大学转来的夏济安、北京大学转来的柳存仁等人，创办《文哲》杂志，邀请名家讲座，在光华大学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。张芝联从光华大学毕业后，又与众好友一起编辑《西洋文学》，宋淇与吴兴华都为该杂志撰稿，张芝联也在《燕京文学》上发文，《西洋文学》与《燕京文学》的“南北呼应”，正是这个松散的文学生群体友谊的象征。1941年，《西洋文学》停刊，张芝联重新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院，攻读历史，他与吴兴华也正式会面，他们在北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1944年，张芝联携妻子郭心暉（笔名郭蕊）从北平回到上海，1946年夏出国进修，1947年11月归国后，张芝联回到光华大学任教，与吴兴华也恢复了通信。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一册开明



吴兴华

书店初版本《谈艺录》，扉页有一处签名：

兴华惠存  
芝联寄自上海  
卅七年七月

从这则史料信息基本可以推断吴兴华初读《谈艺录》的时间。《谈艺录》于1948年6月出版后，吴兴华就在书信中向好友张芝联求购此书，张芝联在7月份就将此书寄予吴兴华，按照当时北平上海通邮情况来看，吴兴华在8月肯定就收到了这本书。读了该书之后，吴兴华发现了其中一些错误，他大概是直接写信给钱锺书指出了出来，在1949年7月开明书店再版的《谈艺录》中，钱锺书新增添了一处附记可兹证明，不妨照录如下：

此书刊行，向君觉明、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，为订勘舛讹处，余复寻绎，觉有待补直申说者尚多，适将再版，因得更定。董而理之，俾无失坠者，乃周君振甫也。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识。

从这几行附记又能够看出，当时给钱锺书指出错误的不止吴兴华，还有一位著名学者向觉明，也即向达（1900—1966）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1935年秋曾在牛津大学鲍德利（Bodley）图书馆工作，其时钱锺书携妻杨绛刚到牛津大学留学，他与向达很可能在此时结识。此后，向达遍访欧洲，搜集了大量关于中西交通史、敦

煌写卷、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。1938年，向达携带数百万字资料回国，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，抗战胜利后，向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他与钱锺书的联系应该一直没有中断，钱氏《槐聚诗存》收录了《向觉明达属题 Legouis 与 Cazamian 合著英国文学史》三首：

火聚刀林试命回，又教夙好拨寒灰。

荒城失喜书棚在，也当仁慈寺里来。

费尽胭脂画牡丹，翻新花样入时难。

覆瓿吾与君犹彼，他日何人访冷摊。

一载书借诚痴事，双泪珠还亦苦心。

太息交游秋后叶，枝头曾见绿成阴。

本诗所涉《英国文学史》（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）是由两位法国学者 Emile Legouis 与 Louis Cazamian 合著，于1930年出版，向达1952年从朝鲜回国，在辽宁安东（今丹东）旧书摊上买到此书，颇为珍视，后来被人借去，久假不归。向达以事绝交，书才被还回来。钱锺书因之作诗调侃，可见向达对这部文学史的钟爱，也能看出两位学人之间的情谊。

《谈艺录》再版本后附有勘误表一栏，列出了错误30处，这其中应该既有吴兴华、向达、周振甫所勘误，亦有钱锺书自己校订出的。显然，向达、吴兴华向钱锺书指出《谈艺录》中的错误后，钱锺书就已经在考虑再版修订的问题，他在1948年12月又重新将《谈艺录》初版本校订了一遍，1949年6月再版后，《谈艺录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陆都没有再版，直到1984年才出了补订本。从再版本附记里，也可知钱锺书对周振甫的感激之情。周振甫1933年就进入上海开明书店做校对工作，可谓一名资深的学者型编辑，他为《谈艺录》的校勘出版做了很多贡献，钱锺书将其

引为“石友”，有诗为证：

伏处嘤嘤语草虫，虚期金潮健康空。

班荆欲献来今雨，扫叶还承订别风。

臭味同岑真石友，诗篇织锦妙机工。

只惭多好多无成就，始笑兰陵五技穷。

在1984年出版的《谈艺录》补订本中，钱锺书在引言里再次提到了与周振甫因《谈艺录》结下的深厚友谊，他说，“当时原书付印，君实理董之，余始得与定交。三十五年间，人物浪淘，著述薪积。何意陈编，未遭弃置，切磋拂拭，犹仰故人。”《谈艺录》补订本分上、下编，上编基本以1948年初版本为底本，加以删削。下编则主要是钱锺书在建国后最新补订的内容，上、下编互为对照，相辅相成，如钱氏所言，“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。”1984年补订本保留了初版本的序言，但是却唯独没有收入1949年再版本的那段附记。而这附记则是证明吴兴华与《谈艺录》之关系的重要史料，因为吴兴华与向达于1966年先后离世，至于钱锺书为何在《谈艺录》补订本中删掉了关于两位好友勘误的附记，其缘由我们已不得而知了。

向达比钱锺书年长十岁，他们早在牛津大学就已相识，算得上是老友，他对向达的学问应该是佩服的。而吴兴华比钱锺书小十一岁，他们此前并不相识，当然，宋淇可能对钱锺书谈起过他这位燕京大学的同窗好友。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再版本附记里竟将吴兴华与向达并列致谢，认为他们“直谅多闻”，可见钱锺书对这位后辈学人的欣赏。抗战胜利后，吴兴华重回燕京大学任教，但他在北平的朋友并不多，像宋淇、张芝联等这样交心的朋友更少，他之所以因《谈艺录》与钱锺书通信，可能有与钱氏结交的用意。吴兴华的这种行为也许有些鲁莽，但这恐怕体现了这个燕京天才敢于与学界权威商榷的勇气，也体现了他对自己学问的足够自信。

## “谢谢捧场”——李文俊文集漫笔

## ■ 朱航满

近年我有搜购钱锺书先生题签著作的嗜好，李文俊先生的文集《妇女画廊》便是因此而得的。于是写信给李先生，将书寄过去请先生签名留念。一周后，收到李先生用快递寄来著作两册，一为《妇女画廊》，一为《西窗漫笔看花》。前者由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，是我在孔网旧书店买到寄去的，先生在扉页题字如下：“航满先生匡正 李文俊 2017.10.2”，又有读者对拙作感兴趣，感到不胜荣幸。”后者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，收入“开卷书坊”之中，系精装毛边，乃李先生赠我，扉页题字如下：“航满先生匡正：李文俊 二〇一七·十二。”收到赠书后，给李先生去电表示感谢，先生问我买《妇女画廊》所费几何，答之价格，他说又涨价了，是因为有钱先生题签的缘故。询问近来身体状况，先生告知视力不佳，只能偶尔看看写得很好的散文、翻译和写作皆已停笔。随后我粗翻《西窗看花漫笔》，发现第224页有则笔记，颇有相似之处。此笔记提及一位常州读者寄书请其签名，又附信颇多赞词，先生读后特在扉页题字“谢谢捧场”四字。

《妇女画廊》是李文俊先生出版的第一本文集。据他在文章《过迟的悔改》中回忆，当时重庆出版社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，拟编订一套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文丛》，他忝列该

文丛编委，后因该丛书责任编辑对其仰慕，为李先生出版了这册集子。关于此书题签，在《过迟的悔改》中，收有钱锺书先生给他的回信：“文俊同志：我因拇指痉挛，近两年谢绝一切题签之类的，聊以藏拙。但你来信善于措辞，上可比‘游说’的苏张，下不输如‘说因缘’的鲁智深，就不得不献丑一次。如有人问，请说是一年前勉强我写的(a little lie)，我盖的章也是历来用的旧章，不是去年一位名家送我的新章。至于佩芬同志方面，杨绛别有交代。不多写了，预祝大著出版后‘不胫而走，无翼而飞’（下句成语给流行习惯搞成另一个意义了）！钱锺书。”从此信可判断，李文俊应属于钱锺书比较欣赏的晚辈学人。由此我也发现，真正能够领略钱锺书学问者，大多谦虚。诸如在《妇女画廊》后记中，李文俊写他为其中一篇《西窗看花漫笔》作题记，写得饶有趣味：“我曾想用《小篇什》作这一辑的题目。倒不是想攀附‘雅颂’，而是难以忘怀少年时一个小女孩的答话。当时我问她弹奏的是什么曲子，她从钢琴上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说：‘小 piece 呀！’这‘piece’倒正好与‘篇什’谐音。后来想想，靠写短文换几个小菜钱还只是一年来的事，不如径叫它《生日礼物》，也算是一个老编辑对青年读者的一片心意。”

《西窗看花漫笔》所收文章共分三辑，分别为“过去完成时”“过去时”和“不定式”。翻读《西

窗看花漫笔》，因为是毛边收藏本，所以只打算看一些不用裁读的片段，不料先读了《静轩杂录》，发觉很有味道，竟一读而不能罢手。李先生说他晚岁所作这些拟古的片段，乃是效仿《世说新语》和《随园诗话》，而我发觉其谈论英文文章妙处的片段，竟也与董桥的《英华沉浮录》异曲同工，于是边裁边读，终将全书读完。文俊先生的文章隽雅洒脱，又有一种洗净铅华的朴素与从容。在《译伍迪艾伦的〈拒收〉》的结尾，先生谈到出版社需其提供的译者简介，他如此写道：“李文俊，曾任编辑，译过福克纳作品，喜写幽默短文。”这简介是他效仿伍迪·艾伦而作，其中“喜写幽默短文”一句，既契合又高雅。在文章《我这一辈子》中，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翻译的经历，郑重而又极为形象地总结道：“我这样做，有点像是个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。说实在的，我不甘心让自己，说得难听些，成为一位大作家的‘跟包’或是‘马仔’。如果我是演员，我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独立品格的演员。如果我是音乐演奏家，我一定努力使自己能具有个人的演绎方式。”

李先生曾多次对《漫笔》编者子聪说，此书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了。然则，我在网上一搜，发现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，名为《有人喊 ENCORE》，我便心满意足，于是赶紧下单。此书封底印有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，下面还印有一段

话，竟是不才所写。钱先生那段话选自他写给李文俊的一封信：“Faulkner（福克纳）的小说老实说是颇沉闷的，但是‘Ennui has its prestige（沉闷也有可敬之处）’，不去管它了。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。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。”而才的那段话，系一篇关于李先生的访问记，这里则摘选下面这句话：“在我的印象中，李先生似乎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，诸如福克纳，诸如门罗，也诸如他后来也翻译过的海明威，甚至还有中国作家莫言。莫言正是读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小说，读了李先生为福克纳小说所写的长篇序言，从而受到启发，由此开启了建构他的文学王国的写作之路。为此，我戏称李文俊先生为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的‘专业户’。”这段话并非高明，但多少能够说明李先生的眼光。

《有人喊 ENCORE》，我便心满意足，于是赶紧下单。此书封底印有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，下面还印有一段

的译文比拟为“仅仅是由我自己演绎的一次演出而已”，“能听到有人喊一声‘ENCORE’，我便心满意足”。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，他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，便是“译者何必得贬低别人以求抬高自己呢”。他举例说自己应出版社之约，翻译了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这是很多翻译名家竞技的文本。在他看来，他的这一本，特别之处是译出美国鳏寡孤独老人的味道，这也便是他所谈及的“由我自己演绎的一次演出而已”，故而希望“能听到有人喊一声‘ENCORE’”。

关于文俊先生的其他文集，我此后又陆续购得四册，分别为《行人寥落的小径》《寻见与找见》《纵浪大化中》《天凉好个秋》。《行人寥落的小径》200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入该社策划的“蓝调文丛”之中；《寻见与找见》2002年5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收入该社出版的“巴别塔文丛”之中，这两册文集的内容与其他文集均多有重复之处。《纵浪大化中》与《天凉好个秋》倒是值得说说。《纵浪大化中》系九州出版社1992年出版，列入该社的“译人视界”丛书之中。此书很薄，但特点鲜明，内容多系他在担任《世界文学》编辑过程中所结识的前辈文人，如朱光潜、钱锺书、杨绛、余光中、萧乾、徐迟等。此书的书名来自作者收藏的一份朱光潜先生手迹，是用钢笔来抄录的陶渊明《形影神赠答诗》中的两句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

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由此书可以看出，先生虽生性淡泊，但对于收藏前辈手迹，也是颇有一些喜好的，这其中便有一种对于前贤的尊崇和感恩。他因工作缘故，收藏了周作人1964年4月12日致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的一封信，内容谈翻译希腊神话书稿中的一个注释问题，是他与知堂老人的一次交往记录，虽历经波浪，依然精心宝藏至今。

先生晚近所作的一册特别的著作《天凉好个秋》由上海书店2007年1月出版，小精装，列入陆灏策划的“海上文库”中。在网上看到一位书友关于此书的短评，写得感性而动情：“李文俊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，我总是能沉醉在这种家长里短的文字里。逐渐逐渐地，喜欢上这种辗转、啰嗦、细腻、顽皮、超丰富的、想象力的文字。一下子用了这么多形容词，我还觉得没有尽说。他看似平凡的文字里就是有那么巨大的魔力吸引着我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书还有十几页就看完了。我几乎舍不得再看下去了，一天就看一个小章节便放下。因为我不知道看完了它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。”这位书友最后两句话实在说得太动人了，令我对此书也是心向往之。买来几乎一气读完，恰如这位书友所言之美妙，但也许是期待过高，读后也有些不满足。我很认同李先生引用英国诗人 William Blake 的一句诗来评价此书的价值：“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.”